

陶行知与 当代中国名人

汤翠英 编著
吴梦进

南京大学出版社

e a MEXICO!

peón de
xplica el
México

DOCTOR TAO



一九三七。九。陶行知在墨西哥演讲宣传抗日

痛悼偉大的人民教
育家
陶行知先生千古
哀悼

毛主席題詞

萬世師表

宋慶齡



宋庆龄题词



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同学合影
(前排右一是陶行知 右三是胡适)



1917年陶行知学成离美国回国，图为途中在船上与同学合影（前排左一是陶行知，后排右一是陈鹤琴）

前 言

陶行知（1891～1946）是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改革，创立了举世闻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先后创办了南京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新安旅行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他的学生中人才辈出，有著名的政治家、有著名的教育家、有著名作家、有著名音乐家、艺术家，也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还有一大批在不同领域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专门人才。由于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极端、片面、粗暴的批判，株连了推崇武训“行乞兴学”精神的陶行知，致使这位名列近代世界八大教育家的“生活教育”理论创立者，在中国一度鲜为人知，本应成为中国新教育奠基石的“生活教育”理论，也“石”沉大海了。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国外已有 20 多个国家或地区有专职人员从事“陶研”工作，出现了一批以“陶研”为终生职业的专家、学者，并在其国家将“生活教育”理论推广运用，获得显著效益。

我国教育界对多年来教育迟滞、理论陈旧、方法落后、质量低下极为不满，在寻找中国教育出路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反思和比较，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江苏和安徽两省率先发起成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几年来，全国已有近 20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1985 年 9 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在北京成立。陶行知教育思想系列研究被列

入国家教育科研“七五”期间重点项目。在江苏、安徽、上海的三个陶行知纪念馆接待了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香港）的学陶、研陶、师陶者，接待了来自英、美、法、日等 20 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和参观者。陶研界创办了正式专业刊物《行知研究》和一些不定期刊物。在全国师范学校中已陆续开设《陶行知教育思想》课。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批准整个黄山市（原徽州地区）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区，建立了行知小学、行知中学和行知专科学校，进行整体实验改革，并在全省大力推广农业、科技、教育多位一体的做法；四川省恢复了“生活教育社”，进行创业教育，在合川县进行整体实验改革；上海成立了行知艺术团；浙江成立了行知艺术学院；江苏省江浦县五里行知小学进行了八年实验，效果明显，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曾派员考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日本来华攻读陶行知教育思想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已经毕生，国内也培养了一批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硕士、博士生。

近年来，出版了《陶行知全集》及配套的材料，为了促进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研究，大型丛书《生活教育研究资料丛书》也正在陆续出版。

二

陶行知，1891 年生于安徽歙县黄潭源村，原名陶文濬，又名知行，后改为行知。幼时由于天资聪慧，好学上进，又处徽州文化区，从 6 岁至 17 岁一直被有识之士免费收为学生，19 岁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曾主办学生办的学报《金陵光》。23 岁赴美留学，先入伊利诺大学，与孙科同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与胡适同学，获“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1929 年又获科学博士学位。他和胡适是世界著名学者杜威博士的两个最得意的外国留学生。

1917 年，陶行知学成回国，应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代理教务主任，任教务长。他考察中国教育的现状，在学校首次

提出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主张教与学结合，好的先生不是教“书”，而是教学生学，反对沿袭陈法，仿效他国，立志不做政客教育家和书生教育家，而要做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第一流教育家。1921年至1922年，主编《新教育》杂志，起草《中华教育改进社简章》，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致力于教育改革。由于与晏阳初的思想认识不一致，1925年，陶行知将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分立出来，进一步考察国情，成为留学学者中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第一人。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陶行知把教育的注意力放在农村，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把革命重心转到农村去有一定的启发。陶行知在研究乡村教育时，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乡村幼稚园，并筹备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7年3月，南京晓庄师范正式开学，通过实践和理论研究，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受到国内外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1930年4月，由于晓庄师范师生声援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晓庄师范被国民政府封闭，支持师生正义行动的校长陶行知也遭通缉，不得不避难上海和流亡日本。1931年回国，受史量才之聘，任《申报》顾问，曾在《申报》上发表大量杂文，抨击不抵抗主义，主张抗日救国，并在上海搞“科学下嫁”运动，创办山海工学团，自然学园和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等，提倡“小先生制”和“即知即传人”，普及大众教育。1936年，发起成立国难教育社，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同年7月，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和世界和平大会，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国民外交活动。回国后，在香港创办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又在四川创办了育才学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生活教育”理论，并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参加民主运动。李公朴，闻一多被刺后，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刺杀黑名单的第三人。他置生死于度外，仍然为教育振兴和民主运动奔走呼号。1946年7月25日，不幸患脑溢血溘然逝世。

陶行知一生不断进取，不畏艰险，不计个人得失，富于献身精神，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教育家。吴玉章称他是“前无古人的教育家”；宋庆龄称他为“万世师表”；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仅教育思想富有魅力，它的伟大人格也倍受称赞。翦伯赞盛赞他“有儒家的风度，墨家的慈爱，基督耶稣的精神，他是自古以来哲人的合体”；郭沫若说：“陶先生是一个真善美三者具备的完人”；钱俊瑞说：“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了万丈光芒，他曾向全世界发射出我们祖国特有的十分杰出的火花”。周恩来得知陶行知去世的噩耗，悲痛过度，推迟了原先约定会见马歇尔的计划，并赶去向陶行知遗体告别。1983年，梁漱溟还曾著文写道：“想到我亲切结识的盖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不外三人，而陶先生实居其一，其他二人便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三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博大精深，其基本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陶行知自己给“生活教育”下的定义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所需要而教育”。“给生活以教育”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用生活来教育”指教育来源于生活，“为生活向前向上所需要而教育”指对教育目的的具体要求。关于生活和教育的关系，他认为是生活决定教育，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其一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人们在社会上生活不同，因而所受的教育也不同，“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过糊里糊涂的生活，便受糊里糊涂的教育”。其二是“要想受什么教育，便经

过什么生活”。他所提倡的生活，是健康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过少爷生活，虽天天读劳动的书籍，不算是受着劳动的教育；过的是迷信生活，虽天天听科学的演讲，不算是受着科学的教育；过的是随地吐痰的生活，虽天天写卫生笔记，不算是受着卫生的教育；过的是开倒车的生活，虽天天谈革命的行动，不算是受着革命的教育”。显见，“生活教育”是叫教育从书本的到人生的，从狭隘的到广阔的，从字面的到手脑相长的，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是拿全部生活去做教育的对象。从教育的效力上来看，认为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生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

“社会即学校”是与“生活即教育”紧扣在一起的。陶行知认为“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不消谈什么联络而他血脉是自然相通的”。“社会即学校”是主张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到处可以办教育”，多渠道，多轨制办教育，除了青少年要受教育，还要有成人学校、老人学校，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其二是教育不脱离社会的主要任务。教育不应成为“少爷的手杖，小姐的钻戒，政客升官的梯子，书呆子的轮回麻醉的乌烟”。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要求，便是盲目的教育。“社会即学校”主张拆掉学校和社会中间的高墙，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并不是把社会和学校截然等同，而是要冲破传统学校的桎梏，打破当时少数统治者对学校的垄断，更不是宣扬“学校消亡论”。他自己一生曾创办了许多所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都获得了很好的教育效益。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对教育的方法，陶行知探索走过了三个阶段，即“教授法”到“教学法”而后到“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的含义是：“教的法子要把握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这是分析生活与教育的关系得出来的。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

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的三个方面，不是许多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一个整体，要教学首先必须有手和脑的配合与思想和生活的结合，换句话说不单是要“劳力”，同时也要“劳心”。“教学做合一”体现了“重知必先重行”的原理，就是把理论与实践合为一炉而熔之。教、学、做三者，做是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主要内容包括：手脑眼并用，在劳力上劳心，这就是在“劳”的基础上求知，进一步发展到自觉觉人，即知即传，这个“觉”和“传”就是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行，集体主义自我教育是这两步的进一步发展，是“求知之行”的最高阶段。“教学做合一”是指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做，与“在做中学”以学为目的是不相同的，这是陶行知教育理论与杜威教育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根本区别。

从“生活教育”理论的三大主张可以清楚地看到，彻底地反对旧传统教育，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普及教育是这一理论的精髓和本质特征。“生活教育”理论主要的基本特征还有：第一，“生活教育”把政治与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陶行知培养的学生不是书呆子，都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普遍成为中国革命的忠诚参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家里手。第二，“生活教育”不是一个静态的、机械的、等待的看法，而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追求的学说。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所以能摆脱历史的、门户的见解，逐步达到为时代需要、为人民大众需要的境地。第三，“生活教育”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产物。特别申明反对洋化教育，并不反对外来的知识，反对传统教育也并不反对固有的观点。第四，“生活教育”在哲学上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信认识离开社会的生活实践无法发展，知识和人格离开生活实践也无以为形成和发展。同时又认为教育是改革社会的，包含了知识、情感、信念教育在内的教育

教学原则。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辩证唯物主义特征和丰富的教育教学内容，这就是“生活教育”理论成为中国近代富有魅力的教育学说的原因所在。

四

研究陶行知和“生活教育”理论，有必要研究陶行知与其同时代人。他们在从事教育事业、从事民主活动中以及其它革命活动中相互启发，彼此影响，这是陶行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研究陶行知与其同时代的人，有助于我们看清陶行知各个时期的经历以及在近代革命史上的位置，有助于我们认识陶行知与其他社会名流的异同之处，有助于我们摸清“生活教育”理论产生、发展的脉络和陶行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轨迹。

陶行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教育事业的贡献，包含着中国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团结战斗的集体创造的结晶。

目 录

前 言

陶行知与周恩来	(1)
陶行知与宋庆龄	(8)
陶行知与冯玉祥	(13)
陶行知与吴玉章	(21)
陶行知与徐特立	(25)
陶行知与蔡元培	(29)
陶行知与郭沫若	(35)
陶行知与田 汉	(41)
陶行知与沈钧儒	(48)
陶行知与胡 适	(53)
陶行知与黄炎培	(57)
陶行知与邓初民	(62)
陶行知与翦伯赞	(67)
陶行知与邹韬奋	(72)
陶行知与梁漱溟	(77)
陶行知与张伯苓	(81)
陶行知与陈鹤琴	(87)
陶行知与高士其	(92)

陶行知与刘季平.....	(97)
陶行知与戴伯韬.....	(105)
陶行知与方与严.....	(109)
陶行知与王洞若.....	(124)

陶行知与周恩来

周恩来与陶行知的友谊是在重庆育才学校时期建立起来的。

1938年9月，陶行知完成了他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在28国宣传抗战的使命回国后，看到一些具有特殊智力和才能的儿童遭受摧残，得不到培养时，便毅然放弃高官厚禄，创办一所拯救国家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座落在四川省重庆市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内。当时周恩来主持党的南方局工作。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就住在重庆市曾家岩50号，周恩来对陶行知十分信任。

育才学校创办不久，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特地派延安马列学院毕业的中共党员廖意林来校组建地下党组织，支持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当时廖意林对党员就曾这样说：“我们党的领导（指南方局）曾经明确地告诉陶先生，育才有党的组织，哪些人是共产党员，并且告诉他，这些党员的任务，就是协助他办好这所学校。”陶行知也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千方百计地抵制国民党反动派对育才党组织的破坏。他经常到中共代表团的住地去，回来后还常把几个党员负责人找来传达周恩来、董必武等的指示精神。他常对人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闻讯，恐吓陶行知说：“你的学生和 朋友中很多人是共产党……”陶行知回答说：“他们是否是共产党员，额角上未刻字，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员，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由于陶行知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国民党反动当局不敢明目张

胆地破坏育才学校，就以学校训育主任必须是国民党员，如果没有则由政府委派之“规定”，企图在育才学校成立国民党组织来暗加控制。为了粉碎这一阴谋，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地下党支部经请示周恩来、董必武批准，指定了三个党员，又动员了三个非党同志，一起“加入”了国民党，并通过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关系，拿回了五个国民党党证来应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又帮助陶行知将育才学校迁至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附近，以保护育才师生的安全。1946年春节，周恩来还特地邀育才学校师生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过春节。联欢会上，周恩来希望育才师生“要象陶行知先生号召的那样，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并激动地说：“我们现在正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准备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中共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校长陶行知先生担任民主政府的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呀？”他的话音刚落，场上顿时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周恩来还大力支持陶行知先生发展育才教育事业。

1940年秋，“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在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企图逮捕育才学校的共产党员，迫害育才学校师生。就在这危难时刻，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新华社记者张晓梅的陪同下对育才学校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

陶行知陪同周恩来等一行参观了育才学校的课堂、办公室、宿舍、厨房、图书室、实验室等，连农田也看了。周恩来参观之后又给育才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他希望大家“要为真理而斗争，为新中国的远大前程而奋斗”，并结合自己的童年鼓励孩子们说：“如今你们这一代青年太幸福了，你们学校里有这么多好老师和大量的进步书刊，这是很好的条件。希望你们要为真理而斗争，要努力学习，要一代胜似一代。”他还说：“我小时候还梳着小辫子，读的是私塾呀！”周恩来作完了报告，还不知疲倦地给孩子们写下了一幅又一幅的题词——“一代胜似一代”。周恩来的报告和题词极大地鼓舞了育才学校师生同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当天夜里，

周恩来还找了不少同志谈话，具体布置了育才学校地下党员的转移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军警、特务果然持枪来育才学校抓人，但是，育才学校目标较大的地下党员都已经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转移出去了。

周恩来参观育才学校后不久，“觉得小孩子们健康欠佳，特捐助四百元，为孩子们购买运动器具之用”。为此，陶行知还特地写信给育才学校，说明“这是指定捐款，请开具正式收据交下，以便送去致谢。”

1949年11月初，育才学校留在重庆的部分师生处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政治上倍受迫害，经济上面临绝境，这时，又是在北京操劳国家大事的周恩来同志，通过党在香港的关系，设法给育才学校送去《群众》杂志和八百块银元，帮助育才学校度过了难关。

周恩来和陶行知互相关怀情同手足。

1943年，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对育才学校实行经济封锁，陶行知不得不整天在外东奔西跑，筹募经费，有人劝他：“何必抱着石头游泳？”陶行知回答说：“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在游泳，越游越有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周恩来对此十分感动。他同董必武立即派中共驻渝办事处徐冰同志给育才学校送去毛主席在延安组织生产自救的一套照片，还送给陶行知一件延安织制的灰色毛线衣。陶行知收到后，深受感动和启发。他立即动员全校师生上山开荒生产，既解决生活困难，又锻炼师生们的革命意志。1946年，周恩来在南京，陶行知前往梅园新村看望，周恩来还嘱咐陶先生要注意后面的“尾巴”。

周恩来和邓颖超等参观了育才学校后，陶行知随即写信给育才学校，承担了周恩来等一行参观育才学校的一切费用。信中这样写道：“关于周恩来、邓颖超诸先生来校参观的一切费用，由我个人承担，照来单所示计饭菜 25.90 元，滑杆 20 元（上山坐担架的脚力